



摩拓到纸上的历史与美

□ 霜枫酒红



“南北朝时已发明了拓墨的方法。萧绎所集碑文大约就是拓本。”按照著名学者张政烺在《中国考古学史讲义》一书中的观点,大约1500年前就有了摩拓石刻铭文的做法。

近年来,随着保护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各界共识,碑帖收藏、研究开始超越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书法等传统领域而延伸到城市景观、装置艺术等更广的领域,并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尤其是在与文创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大众化、多样化的新产品,“金石复兴”一时间燃起新景观。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代遗存下来的文字有不少是在石头上记下来的。据记载,大约春秋时期就有人把文字刻在石头上了。战国初年的《墨子》中讲怎样保存文字记录的时候,就提到要刻在金石之上。“金”即青铜器,“石”就是石头。今天我们在很多博物馆都可以看到青铜器,其中一些就有铭文。例如,最早的“中国”就出现在青铜器“何尊”上。这些铭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推进书法艺术的发展中作用甚大,历来为书

法史家所重视。

唐朝贞观初年,人们在今天的陕西宝鸡发现了10个石鼓,上面的刻字记载着公元前8世纪时秦国的事情。石鼓刻石文字多残缺,原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2013年1月《国家人文历史》杂志邀请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盘点出包括太阳神鸟金饰、西周利簋、秦石鼓文在内的“中国九大镇国之宝”。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被历代书家视为学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有“书家第一法则”之誉。20世纪90年代宝鸡市修建了石鼓阁及中华石鼓园,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景区;石鼓阁还成为宝鸡市的标志性建筑,被誉为“西北第一阁”。

青铜器、石鼓等珍贵文物上的文字流传后世的重要途径就是拓本。也正是有了这些拓本,后人得以回望一段历史、体味一段文明,得以获得别样的艺术享受、开创新的艺术衍生品。

时光进入西汉晚期,有人开始用石板刻字,记述墓主的姓名、官位、卒葬年月等内容,即墓表;之后所刻文辞渐多,详细记述墓主的姓名、家世、生平、事业及歌颂的

诗铭,即墓碑。古代人刻碑,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碑文由书家直接用朱墨写在石上,再由石工刻凿而成;另一种则是摹勒,用双钩法将书法真迹钩摹于石上后刀刻而成。

当然,古代的碑不仅仅是用作标识墓主、铭功颂德、纪事立言,还被用来刻写经文、药方、书目、谱牒、地图、天文图等,用途多种多样。三国以降,曹魏政权多次严令禁碑,树碑之风自此凋敝。不过习俗难改,地上树碑转向埋入地下,出现了碑形志或墓碣、墓表等替代墓碑的变异形态。

北魏时期,墓志形制趋于成熟,多见方形。北魏以降,除方形、长方形和碑形墓志之外,还见有龟形墓志。墓志铭文一般前冠有墓志题名,次记死者家世、生平、卒年、葬年、葬地、夫人子女情况,最后附以铭文颂辞,多以楷书刊刻。唐以前的墓志基本不标出撰书人、书写人和刻手。进入唐代,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并身体力行,不仅亲书碑文,还时常敕旨诏命当时有名的书家撰书碑文。从此,墓志就出现了撰书人、书写人和刻手。历代墓志的大小、文字的多寡、雕刻纹饰的精粗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有

关。一般来说,墓志基本依照封建等级礼制,地位越高者拥有形制较大的墓志,其铭文字数较多,志盖雕刻纹饰亦较精美繁复。

保存至今的古代碑、墓志、造像、刻经、摩崖题刻、画像石、经幢等,都是古代石刻。石头的物质属性不利于其传播,拓本可以存真并且在物质性载体转换后扩大了石刻图像和文字的影响力,同时成就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样式。

碑志拓本承载着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对于研究政治、经济、军事、文献、文物、书画、人物、民族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是历史发展的重要佐证。唐代,拓本习字方法被上层士大夫普遍采用。两宋时,拓本成为一门集金石、考古、美术等为一体的独特艺术并延续至今。

遗存了众多北魏、辽、金、元等碑志的大同地区,如今越来越成为碑拓领域的关注点,不少有志者加入到拓本艺术的学习、制作、研究、传播中,希望通过凝固在纸张上的美让更多的人读懂曾经的鲜活历史,感受到先辈的创造伟力,在艺术滋养中建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讲述城市故事、传播城市声音、丰满城市形象。

传统文化节目耀荧屏



新春伊始,传统民俗氛围正浓厚,一批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质电视节目火爆荧屏,全国观众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其中,不少节目深入挖掘诗书画等古老文化载体的丰富内涵和当代价值,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徜徉在精彩的视听画廊,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增长见识、提升境界、净化心灵。

《诗画中国》中,朗诵表演艺术家瞿弦和与舞者李响以诗舞的巧妙结合演绎唐伯虎笔下雪景;《2023中国诗词大会》里,现代虚拟仿真技术打造的数字人苏东坡跨越时空,与真人演员饰演的黄庭坚在电视舞台还原了当年的鄱阳湖相会,为选手出考题;总台春晚舞台上的创意节目《满庭芳·国色》以舞为语、以曲为韵,将桃红、凝脂、绀叶、群青等有着优美名字的中国色娓娓道来;歌手王晰和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小号手朱德恩在《经典咏流传·大美中华》中把二十四节气唱成歌……文人墨客的至高理想、劳动人民的生活细察、古今同频的家国情愫,在演与唱、奏与舞中尽数迸发,以中国式审美为中国电视的传统文化之旅揭开序幕,让传统文化的富矿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散发出耀眼光芒。

由诗词等切入挖掘中华文明内涵、传承中华美学境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是一项极具魅力也更具挑战性的创新工

作。在众多文化节目中,首次亮相的IP《诗画中国》,以“诗画合璧”的全新样态和新颖视角,赋予传统诗画更丰富的展现空间,讲述诗画背后的历史故事、时代精神,描绘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历史画卷。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虽分属文学、艺术两大门类,但对思想境界的追求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苏轼评价王维的诗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道出了诗画艺术同源、同道的本质属性。《诗画中国》据此首创“诗画合璧”模式,让横跨数千年的经典诗文与传世古画相得益彰,折射出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灿烂文明,可谓一部诗画版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发展简史。

以诗解画,以画炼诗,诗画相生。当我们靠近王冕的《墨梅图》,“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卓然气息便扑面而来;当我们展读郑板桥的《竹石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志士情怀便油然而生;当我们站在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前,“山高水长,物象千万”的震撼观感便有了具象的承接……这就是《诗画中国》这档节目所造就的独特体验。它以“画境”统摄传统要素和当代形式,以“诗魂”穿越古今场景和生活阅历,既注重挖掘经典意涵,突出诗画历史的厚重感,又注重讲述诗画外的“烟火故事”“传奇故事”,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不知不觉间贴近现实生活,走进人们心中。

诗书画等文化载体,形式不同,本质上都呈现着创作者的气韵、神韵与意蕴,以展示创作者的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理想境界为最高追求。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追求。诸如《诗画中国》《2023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大美中华》之类让传统文化变得时尚前卫的电视节目,以文化载体在我们与古代先贤之间建立起了“超链接”,真正做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古代先贤将自己的理想情怀、价值追求寄托于自然山水、生灵万物,并从中汲取慰藉。在动人篇章或醉人长卷中,无论是洁白无瑕的梅、润泽天下的水,还是俯首耕耘的牛、高雅出尘的鹤,无一不是古代士人的人格象征,他们将自己的人格汇入广阔的大千世界,以自己对大自然的感悟滋润养育、拓展自身的生命成长。而当代的我们,又从这些浸润着先贤智慧的作品中汲取着历史的经验、文化的积淀、情感的考验。经由寄托着创作者深层思考的细致描绘,我们与世间万物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其实就是中国文化载体铸就的中国文化基因,它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肌体、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深处,成为激励、养育每个中国人、中国家庭的文化力量,也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成长注入了连绵不绝的源头活水。选自《学习强国》

“熊出没”换了新颜

春节档上映的“熊出没”系列第九部动画电影《熊出没·伴我“熊芯”》,累计票房破12亿元,创造了“熊出没”系列动画电影单片票房新高。可爱的熊大、熊二陪伴无数家庭度过了欢乐的亲子时光。

《熊出没·伴我“熊芯”》保持了《熊出没》系列一贯的稳定输出,既有完整的故事讲述,又有精细的画面呈现,同时在主题表达、叙事结构、情绪调动、人物塑造等方面也有创新。作品较好地表达了母爱伟大和亲情永恒的价值观,契合中华文化中秉承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呼应了疫情之后中国人更加需要情感抚慰的需求,与现实生活形成了互动。此外,熊妈妈是机器人的设定,也为亲情主线注入了一丝科幻新意。

纵观全片,剧情结构有亮点,故事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熊妈妈开始以反派打手的身份出场,经过多次起伏、迂回、转折,与熊大、熊二兄弟相认。尤其在剧情行进至一小时左右时,经过一番与机甲兽的激烈打斗及母子互救的感人场面,反派抢劫犯南洋被抓,让观众误以为故事已进入尾声。然而,此时真正的反派、此前一直是正面人物的东海教授出场,救走南洋,胁迫熊妈妈抛弃孩子,开始了新一轮更为刺激的反抗与拯救情节。这样一个嵌套式反转结构突破了以往平铺直叙或层层递进方式,使剧情饶有趣味。

该片在喜剧、科幻外衣下,包裹着温暖内核。随着剧情推进,笑点与泪点交替,满足了儿童与成人观众不同的情感需求。当然,如果影片对细节进一步完善,可能会产生更流畅的表达效果。此次《熊出没·伴我“熊芯”》的完成度和成熟度保持了较高水准,展现出一如既往的较强实力。期待《熊出没》系列未来能不断提升精神格局,让动画电影的品质再上新台阶。

网文

